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中日关系 > 论文

政治、外交与媒体1919年日本报纸

发布时间: 2011-08-30 点击次数: 364 作者: 王润泽

政治、外交与媒体1919年日本报纸 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研究

王润泽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日本国内报纸用大量的报道构建了他们理解的五四运动。报纸在全方位报道的同时也有相对集中的主题:从巴黎和会刚开始时的中日亲善合作到“五四事件”前后中国激进派盲目“排日”、欧美人士幕后操纵等。在整个事件中,媒体明显受日本政府立场左右,同时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些许影响。虽然个别知识分子能发出批评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当时并不被重视。实际上,日本报纸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中国北京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以及日美势力争夺在华权益等政治、外交因素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日本媒体;五四运动;《朝日新闻》;北洋军阀;近代报刊;报刊史

日本国内媒体对中国五四运动报道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笔者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已经有所涉及,笔者在文中指出,日本“媒体反应相当迅速,它们运用先进的技术、成熟的报道手段,以及大量的误报和虚报,构建了自己眼中的‘五四运动’,即欧美势力在幕后鼓动、一群暴力学生发动的排日事件”[1],并分析了日本媒体如此构建的原因和社会反响。日本媒体为什么会如此构建五四运动?它和日本政局、中日外交、日美外交等有何互动和影响?反映了日本怎样的媒体文化和策略?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一、粉饰的友好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因此,我们考察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宜从巴黎和会开始。

1919年元旦开始,日本媒体上大量刊登“中日亲善”、“合作发展”的消息和评论。首先,报纸上大量刊登来自中国亲日派的访问或撰文,利用中国上层,直接发表“中日亲善合作”的声音。当时日本最重要的高级报纸《朝日新闻》,1919年1月1日在第2版开辟了“支那大总统徐世昌氏篆”的“朝日新闻众说之鄂”栏目,第1期上即发表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的访谈《钱能训氏谈日支协作与南北妥协》,以及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内藤湖南《战后的支那问题》[2];3、4、5、6版各发表中日友好性质的评论和新闻。2日,《朝日新闻》在2版上发表“支那外交委员会干事”林长民的访谈《日支协调在先》。4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支那参议院长”梁士诒的评论《东洋经济的独立》,呼吁两国“在不伤害他国的利益的范围内,在日中两国于亚洲特殊地位而建立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相互帮助,建立联系”。同日的《支那特使言明》中也写到:

“作为同文同种的国民，为了亚洲，应该共同主张发展，共同为此作出努力。”9日再次刊登题为《对支绝对和平主义》的评论。18日、19日，《大阪每日新闻》在第5版连载中国亲日派殷汝耕的评论《支日关系新纪元》，表达了对中日友好的期望。

此类报道大量出现在《朝日新闻》上，寓意深远。一战期间，《朝日新闻》得到日本政府的大笔资助和津贴，政府希望该报能在内政外交等方面给予政府实在的支持，因此该报的报道实际上反映了政府的意愿。巴黎和会召开前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与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中日外交和日美外交等均有相当联系。1918年9月，日本国内政局在经历了“米骚动”之后，寺内内阁下台而原敬内阁上台。原敬内阁试图调整对内对外政策，对外政策调整以对华缓和为主。11月11日，外务省召开讨论对华贷款问题的首脑会议，新任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提出四条改善方案，希望以公正态度对待中国，统一对华政策。会议同意按这个方向努力[3]。日本政府采取这一外交政策，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获取在华利益，只是手段较之前的大隈内阁和寺内内阁要温和一些，以防激起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与反抗。伴随着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日本媒体紧跟政治风向，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常常发表对华友善的信息。日本媒体如此表现，也与中国政局有关。

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正由亲日的皖系军阀控制，从掌握实权的段祺瑞到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均属亲日派中坚分子。实际上，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为了能真正号令全国，在经济、外交等方面极度依赖日本[4]。因此，北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根本不打算有任何要求。1918年11月下旬，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定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议和条件中并没有包括山东问题。11月25日，陆徵祥向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郑重声明，报纸上所刊载的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等要求“全然是议员们的希望，政府并未考虑上述诸问题”[5]。12月9日，陆徵祥乘船赴欧途经日本时，拜访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并向内田表示，“希望在此次讲和会议上，能充分的与日本政府代表协调一致”，“现在中国报纸上说中国讲和的条件是要求无条件交还青岛，此皆为无稽之谈”[6]。有了段祺瑞政府对山东问题的多次保证，日本内阁并不担心巴黎和会不按日本的意愿进行。因此，1919年伊始，在中国持续不断的反日运动中，日本媒体上出现了短暂的政府间表示友好的文章。

但这种“友好”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在中国方面，自1915年日本逼迫北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以来，反日声浪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媒体还在大谈中日亲善和友好，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日本媒体反应迟钝，对深层政治动态无从把握；二是日本媒体与政府之间有深层契合与互动，接受日本政府的暗示与吹风，报道配合政府的政策转向和重点，替政府做宣传。考虑到《朝日新闻》的特殊地位以及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7]的存在，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在刊登这些友好文章的同时，日本媒体并没有忽略中国各地持续发生的反日运动，“盲目排日”、“反日”的报道也不断出现在媒体上。从数量上看，1月下旬以后日本报纸上“中国的过激派”、“排日”之类的报道开始多起来。到“五四事件”爆发前，《大阪朝日新闻》一共有8篇这样的报道，《国民新闻》大约有5篇。特别是2月10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长沙的排日》后，关于中国“排日”和抵制日货方面的报道越来越多，媒体态度也从中立客观逐渐变为以指责中国为主。2月2日、3日，《大阪朝日新闻》连载关于日中关系的评论《奈何日支亲善》（上、下），声称日中亲善从来都是日本人在单方面努力，中国的表现令人失望。2月17日，该报再次刊出题为《没有醒悟的支那：需要深刻反省》的评论，4月16日又刊出《自杀的排日倾向》，严词指责中国民众的“排日”行为。统观上述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媒体表面上似乎比较客观公正，各种信息、言论全面刊登，但从发表时机、版面语言等要素综合考量，这段时间日本媒体报道的主流还是“中日亲善”，对中国反日运动的报道从篇幅上到数量上都不是重点，显示出日本媒体与政府方面的互动与合作。

二、冲突的核心：山东问题

山东问题是巴黎和会的焦点，日本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因为有与北京政府签订的各条约及北京政府的口头保证，在和会开始之前，日本似乎颇有胜算。我们注意到，在1919年元旦大量刊登中日友好报道的《大阪朝日新闻》的14版不起眼的位置上，刊登了一则只有几十个字的消息《青岛偿还要求》，报道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但当中国国内媒体讨论中国政府应该在和会上要求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更多主权时，中日政府都纷纷发言

澄清“谣言”。日本媒体上对中日政府的澄清均有较为详细的报道。

但“山东问题”还是被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其第一正式提出是在1919年1月27日的“十人会”上。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矛盾焦点在于，日本方面要以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8年9月中日换文密约为准；中国则认为，作为战胜国，中国应当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日本方面提到的两项条约，“二十一条”的部分条款为外人所知，但1918年9月的密约，两国政府相约不对外公布，因此从外交上说，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负有对外保密的责任。中国代表团顾维钧等对这项密约并不知情，顾说自己在1月27日的会议上从日本代表的陈述中得知的。1月28日，中日代表进行辩论，美、法要求中日双方提供关于山东问题的各项条约，顾维钧表示中国政府极愿提供，而日本代表牧野的答复是必须向本国政府请示。中日之间的各项条约也妨害了欧美在华利益，顾此举也是想借助美国力量遏制日本在华扩张。但此举与日本和北京政府之间的约定并不一致，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面见代理部务的北京政府外交次长陈？，表达对中国的抗议，说“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北京政府的表现极为软弱，陈？答称，“大总统注意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过于激烈。今贵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小幡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中国代表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压制日本，无论日本能否受此抑压，而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已不可靠。……况日本亦有相当之体面，不能不极力维持”[8]。

小幡提出的抗议立刻被媒体广为报道。最先报道的是英美人士在华所办报纸，从2月3日开始，他们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日本的野心。2月5日开始，日本报纸纷纷报道小幡的抗议，如《大阪朝日新闻》在2月5日第1版刊登大字新闻《对支警告》。但日本报纸的报道立场明显不同，它们从多个角度论证抗议的“正当性”。同时，日本报纸也有对欧美在华报纸的诋毁，如2月6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露骨的排日手段》一文，指责《京津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日本对北京政府的威胁和企图》乱发日本欺压中国的议论。

在整个事件中，日本几大媒体关注的主题多在于：(1)关于山东问题，中日之间早有约定，不在此次和会讨论之列。《朝日新闻》在这方面报道比较客观，标题内容相对中性，《大阪每日新闻》则激进得多，常常使用污蔑中国代表、中国民众的贬低性词语，如《牡蛎壳的还附——支那南方委员的僻根性》等。(2)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违背国际通行外交惯例，对日本造成损害，而且顾维钧代表在和会上的言行完全是个人行为。如2月11日《大阪朝日新闻》第2版上刊登的《支那政府声明：和会对支警告问题，世上风说多属误传》等，指出中国政府认为是顾维钧的个人行为。(3)中国民众受外来势力影响很大，既有苏俄的激进势力进入中国，也有美英等国的幕后指使等。日本媒体在山东问题上态度强硬是有深刻原因的。在巴黎和会召开前，日本政府对继续占据山东很有把握，一方面，日本不但握有日中条约和北京政府的口头保证，还有英法美等国的支持[9]。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深知段祺瑞政府最关心的并不是山东问题，他当时最为关心的是能否获取日本的支持，如何打击其他军阀，武力统一中国。对日本来说，继续占领山东则更有战略上的考虑。在巴黎和会召开前的1918年12月2日，日本陆相田中义一在日本外交调查委员会上说，胶济铁路“万一出现不处于帝国的情况，这将使我们失去在山东的一切，其结果是丧失了我帝国伸张威力的动脉”[10]。而日本外相内田也指示出席巴黎和会的牧野伸显，和会结果对日本国运影响甚为深远。因此，获取胶济铁路和在山东的特权，成为日本当时的基本国策和在巴黎和会上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不论如何，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将全力以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毫不惊讶，为什么在中国强烈反日的1918年到1919年间，日本媒体一方面大谈中日亲善和友好，另一方面在山东问题上拒不反思、毫不退让，并指责中国的反日力量为“激进派”、“过激派”、“煽动革命”，指责美国是中国反日活动的幕后策划、组织和支持者。这一切的报道组合，正体现了日本政府的态度。

三、全方位立体的构建：“五四事件”

“五四事件”爆发后，日本媒体马上给予了充分而详细的关注。由于日本媒体实行记者俱乐部制度，各家报纸报道比较雷同，《大阪朝日新闻》为日本众多媒体的典型代表，能够代表日本媒体的态度和立场，因此

我们以这份报纸为主，仔细分析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情况。

从数量上看，《大阪朝日新闻》对相关事件报道的篇幅从前几个月的平均26.5篇猛增到223篇，增长8倍还多。而6月份达到了报道的最大量，为225篇，从数量上看基本符合当时事态发展的情况。因为到6月，“五四事件”的影响已经达到全中国，反日的浪潮也最为高涨，因此，日本媒体6月份的反应最热烈。

日本媒体的反应，在5月5～8日，6月5～7、10～15日分别达到高峰，基本上在中国本土发生重大事件的第二天、第三天，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达到高峰，显示出日本媒体在新闻业务领域的成熟作风，这与当时遍布中国各地的日本媒体和通讯员有密切关系。虽然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马上封锁了消息，但还是有大量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从天津到达上海，很快传递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同时，日本报纸在采用国际通讯社稿件方面，也比中国有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信息来源十分丰沛。其新闻内容的来源，除去社论和短评，大致可以分为五种：(1) 在中国的特派员、通讯员提供的电报与通信；(2) 通讯社提供的外电；(3) 外务省的新闻发布；(4) 归国者自身经历的访谈；(5) 专家的解说。

从内容上看，日本媒体对“五四事件”的“排日”性质的构建是相当全面的。首先，报道相当及时全面，5月2日，《大阪朝日新闻》即出号外《山东问题表决》，报道日本的主张在巴黎和会得到支持和实现，并有长篇通讯《山东问题解决》详细介绍日本是如何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山东利益的。同时，号外中也有《支那的论调》一文，引述中国《新闻报》和《国民日报》关于山东问题的论述。5月5日，针对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亦发号外《北京烧打起排日学生的暴动》(副标题为“章公使身负重伤，曹汝霖官邸被放火”)。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各大报纸对中国“五四事件”均进行了大量报道，主题和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表1): (略)

细观日本媒体对“五四事件”的报道，表面上似乎持客观主义，但言辞中已经把运动定性为“排日”学生的一场暴动。5月5日《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北京烧打起》，发表题为《排日学生的暴动》、《排日学生团体袭击支那三名士》的消息，并配发评论《支那人的盲动(一)、(二)》、《北京不稳的影响》等。随着局势的发展，报道的重心从关注事件本身的进展，越来越倾向于“排日”的渲染。到5月末，报道的用词也愈发激烈，“暴行”、“暴动”越来越多地出现，渲染色彩更加浓烈，学生的行为被描绘成一种激烈而癫狂的形象，标题也具有煽动力，如28日的《广东学生的狂态》。

进入6月，报道的渲染色彩升级，《大阪朝日新闻》的主题主要覆盖两个方面：日本人在华遇害与中国学生的疯狂举动。6月4日的《广东的排日暴动》用大号字体报道了当地中国人袭击日本商店的事件，中国人被描绘成狂热的暴徒，为日本读者制造了一种恐慌感。学生团体的形象也逐渐被恶意渲染。6日，《上海的排日逐渐变为恶性事件》一文的副标题强调“我国公民频频遇害”。而在同日的另一篇报道《四处谣言起》中说，“学生团体的成员来到最繁华的街上，强迫商店关门”，并通过多处细节描写强调了当时恐慌的气氛。7日的报道用大号标题将学生运动称为“学生义和团”，文中称学生们分发“杀掉日本人”的标语，强行要求商店交纳“运动费”，还郑重告诫在华日本人不要夜间外出。这一时期的用词再次升级，“猖獗”、“险恶”等词开始多次出现。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狂热的中国学生已经失去理智，不仅伤害日本人，连自己也无意义地牺牲。《亢奋的中国学生用茶碗割头部》一文中写道，学生割伤自己的头部，刺中自己的腹部，一片“鲜血淋漓的凄惨光景”。在日本媒体看来，中国“俨然学生的天下”。

6月上海罢工、罢市开始后，日本媒体将其塑造为中国新的排外运动。《京都日出新闻》6月12日发表了更具煽动性的报道《恶性的排外暴动》，文中写道：“支那的排日运动向各地蔓延，眼下上海的运动最为猖獗。在当地受害的不仅是日本商人，英美烟草公司、书店工厂与其他两三家公司均遭到暴徒袭击。”6月底，《大阪朝日新闻》发表《新加坡发起排日暴动》、《美国士兵对日本人施暴》等报道，又进一步强调了五四运动的严重程度。在大量的关于中国各地的反日报道中，也掺杂着中国政府对学生运动的禁令、取缔，逮捕学生等消息，显示出自5月中旬以来日本对华施压的成果。

“排日”报道立场的形成至少是在年初的时候，此时大量同类报道只是同一立场的渲染、持续和进一步发展。在日本报纸的报道中，五四运动被污蔑为“学生义和团”，报道妄图将这场运动与西方人士反感的义和

团运动联系起来。不过这个企图并没有得逞，因为很多英美人士对这场学生运动是同情的。

同时，欧美人再次成为攻击的对象，多篇报道均认为英美是这场运动的背后力量，这场运动是英美利用中国排日的手段。例如5月6日《大阪朝日新闻》在《北京烧打事件有深层原因》一文中，用大字号的副标题指出“他们所谓的国耻纪念日某国传教士的煽动”。7日，该报一篇题为《排日运动》的报道中再次写道：“特别是像美国人参与经营的中美通讯社发表了国民自决会等排日运动机构的电报和宣言书，借此机会将上海发起的排日运动推广到南方各地。”《国民新闻》在5月6日发表了有关五四运动的第一篇报道《北京突然发起排日暴动》，并配以副标题“由外文报纸教唆”。《时事新报》和《国民新闻》甚至称5月4日的游行中有30多名欧美人参加，是这些人背后煽动了当时犹豫不决的学生。这是明显的虚假报道，日本学者分析说：“这份北京电讯的来源可能是中江丑吉的体验谈。当时碰巧在现场，并用身体掩护章宗祥的中江把袭击者包括三个外国人的事实用煽动性的言辞向坂西利八郎讲述。从三人到三十人，可以看出是过于添油加醋的结果。”日本学者这样解读虚假报道背后的原因：“这也可以解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的日美间的中国市场争霸战中，关心祖国的在华日本人的愿望的显在化表现。每每有事发生时都把日中亲善挂在嘴边，实际却提不出任何具体的有效方法的当权者，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将读者的目光引到妨碍日中亲善的人身上而不会注意到对自己不利的方面，这一点也可以从中窥见。不管怎样，可以感觉得到，这条北京电讯包含了把五四运动的报道向着一定方向误导的意向。” [11]

实际上，嫁祸欧美人士和日本政府的立场有密切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和媒体互相支持，“互动良好”。1919年6月16日，日本外务大臣严厉谴责美国驻日大使莫里斯，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由美国支持的，而且运动一定会引发普遍的“排外情绪”。本来，五四前夕在华的日本报纸就报道说运动是美国扶持的，日本国内媒体也广泛报道说，英美特务煽动学生反日，利用运动扩大他们的市场，同时也有中国政治家们的野心冲突和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日本媒体甚至还歪曲说，“美国正在与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以便把远东推进混乱的深渊”，并号召日本制止这些活动[12]。莫里斯说，日本将此次学运的原因，归结为“除了日本侵略以外的一切” [13]。5月19日，日本出版的《国民》报道说，“美军的兵营以及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被从事反日宣传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用作开会场所，美国公使团捐助了500万日元作为运动的经费”。但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污蔑，被指责的美国公使芮恩施断然否定，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没有人会不同意中国学生的目的和理想，他们是在为民族自由和新生而战。我本人也极感同情，但我当然还是避免与运动的直接接触，因为它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少日本报纸却相当详细地报道了我是如何组织学生运动的。但正如人人都知道的，学生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这些指责只能使人感到好笑。” [14]

日本媒体之所以如此宣传，还受当时日本与欧美外交关系的影响。自西原借款发生后，日本不择手段地执行其所谓大陆政策，已经严重影响欧美在华利益，欧美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因此，日本媒体如此宣传是将矛盾焦点转移到欧美方面，妄图使世人忽略日本外交的错误。当然，日本的这种宣传在很多西方人士那里受到了抵制，但日本媒体主要的读者对象是日本国内的民众，他们深信不疑，这造成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恶感，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顺服与支持。由于西方社会对刚刚发生的苏俄“十月革命”的恐惧，部分西方人士对6月以后发生的中国商人、工人和知识阶层的联合行动开始疑惑和抵制。这种宣传也多少会发生作用，以上海《字林西报》等为首的英文报刊，在6月之前的报道中，对学生运动和中国表达了充分的同情和支持，但在6月初上海爆发大规模的罢市、罢工以后，开始转变立场，如《字林西报》在6月9日便称学生运动为“骚乱”。

客观地说，中国亲美派有意借助美国遏制日本在华扩张，因此，日本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关键是日本媒体的报道完全以配合日本外交和政治统治为目的，不惜捏造和欺骗，实在有失媒体的基本立场与功能，其在二战中完全沦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清醒而孤独的声音:日本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

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报道中，也有一些清醒的声音，但并不是主流。东京帝国大学著名自由主义派教授吉野作造在1919年6月号《新人》杂志上发表对五四运动的感想，并对运动中的“排日”现象进行了分析：

“从前之排日运动，其目标专在日本，而未尝波及彼等所欲扑灭之祸根乃存在乎国内，故彼等之运动，为‘排日’的排日运动，究竟于支那民众，有何等利益，殆未遑顾及。换言之，即纯粹感情的运动是也。而此次则大不然。第一，纯然为自发的，并无何人煽动于其间，虽我国报纸载称某国之煽诱，实则毫无相干；第二，此次运动，具有一种确信的精神，彼等欲达此确信之目的，而所向之标点，乃未尝错误；第三，此次运动，其结果非单纯的排日，彼等之主眼，乃在除去国内之祸根”；“彼等所称之排日，乃排斥‘操纵彼等所敌视之支那官僚之官僚军阀’之日本，必非对于‘赞同彼等之思想’之日本国民有所怀疑也”。可以说，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观察已经相当具有深度，他意识到五四运动不是单纯的排日运动，而是要“除去国内之祸根”，并反对日本军阀官僚。同时，吉野更深刻地认识到此次运动是从代表“官僚的保守思想之源泉”的北京大学开始的，而不是从当时革命思想比较活跃的中国南方兴起，实则代表了中国民众力量的崛起，预示着中国未来新思想、新文化、新哲学等的普遍兴起。对于中国即将到来的这种变革，日本政府应该及时调整对华政策，“历来对支政策，虽未必为‘侵略的’、‘军国主义’的，然至少亦带有此种臭味，非根本铲除不可。吾人始终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主共存之正道，以刷新一切对支政策”[15]。这种观点在当年11月1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有所反映，当日该报发表题为《中国文化运动与中日关系前途》一文，6天后，中国《晨报》转载，并赞扬该文“持论颇为公允，为东报所罕见者”，同意该文提出的日本“政府对华方针以后拟与中国人全体为对象，不宜宥于一方，以与时势抗逆”。吉野还给北京大学的朋友写信，说“侵略成性的日本不但受到贵国青年的反对，也受到我们的反对”[16]。庆应大学的福田德三撰文反对日本“短视”的外交政策，批评它实际上是受“贪婪的资本主义的沙文主义”所指导，中国的反日运动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日本著名的综合性权威期刊《中央公论》也在1919年6月号发表吉野作造的《不要谩骂北京学生团体的行动》，指责日本的官僚和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和有害思想[17]。

可以看出，日本国内并不是全部同意日本媒体所持立场，但这些声音淹没在主流报纸的汹涌报道中，也没有被日本政府所接受。

五、强劲的配合与微弱的反思:媒体与政治、外交

虽然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比较偏激，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政府并不认为中国的形势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危急。运动开始后，日本政府采取相对沉默的态度，直到5月16日，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还乐观地估计，这场运动可能在一两个星期至三星期间完全结束，整个对华贸易不至于发生足以忧虑的打击。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日本政府还是表现出强硬的一面，5月18日起，日本公使小幡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抗议学生的“排日”和中国媒体的“煽动”。5月下旬，媒体开始对日本政府温和的对华政策施加压力。媒体认为，虽然从长远看，日本需要这样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但如果不采取行动，日本的眼前利益必将遭受损失。

六三运动爆发后，日本舆论开始普遍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鼓吹日本政府应向北京政府施压。6月12日，东京《时事新报》发表《上海排日益猖獗》，称上海租界内外险象日增，“故为中外官吏计，诚宜及今以高压手段扑灭之为宜，而为外国计，及今各令其军舰之将卒上陆，尤为上策”。16日，《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社评《支那极端主义势力下的战争物资供应》，要求原敬内阁调整对华政策，认为“若必追随列国之后，仍标榜不干涉，使内乱坐大，此原内阁不得不郑重考虑者也”。日本的眼前利益受到巨大威胁，日本转而开始重点维护既得利益。

日本媒体站在本民族私利的立场上，显示出在外交和政治上的短视，正好与当时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相匹配，客观上推进了日本政府对华侵略和强硬立场。在其影响下，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施压越来越多。但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相当复杂，在民众的压力下，6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将曹、陆、章三人罢免，6月11日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职，6月13日钱能训内阁垮台，北洋政府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按日方要求对群众运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虽然日本国内媒体向政府施压，导致政府微调对华政策，但并未使日本完全放弃对华缓和的态势。实际上，五四运动引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一直持续了多年。

日本近代报纸诞生比较晚，从发展过程看，与政府合作关系一直存在。虽然有比较短暂的倾向于自由报

道的时代，但20世纪开始后，就被政府压制下去，日本媒体对言论自由的争取基本上是个别行为，并没有形成趋势和潮流。因此，日本媒体在战前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和行动并不成熟，有相对较强的依附政府传统。

1918年，日本媒体经历了现代史上最大的言论贾祸事件——“白虹贯日”事件。这一事件之后，日本媒体基本放弃独立立场，一步步沦为政府的喉舌，最终在军国主义体制确立时，被迅速纳入专制统治下的“战时体制”。而事件后第二年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客观上促成了媒体向政府靠拢。在这起外交事件中，日本媒体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进行报道、配合宣传，显示了日本媒体对政府的屈从。从更深层次上看，也反映出日本国民性中的无条件服从的一面。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影响是，日本意识到要征服中国，就必须获得更多信息。因此从1920年以后，日本加大了在中国派驻记者和建立新闻通讯机构的力度。先是日本最早在华设立的东方通讯社(1914年设立)，1920年后改组为日本外务省在华的正式通讯机构，享受政府津贴，发稿权力和影响相当大。后来日本联合通讯社、电报通讯社均进入中国，很多日本报纸也在中国派驻记者。日本政府还用各种手段收买中外记者，为其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注释：

[1]详见拙文《1919年日本媒体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研究》，程曼丽主编《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五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该文客观而详细地分析了中国战后情势，强调建立中日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3]李学峰：《五四运动前后日本对华政策演变》，《团结报》2009年12月17日第7版。

[4]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前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5]《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3册，转引自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第257页。

[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3册，转引自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第258页。

[7]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形成于1890年10月，其前身为“共同新闻记者俱乐部”，目的是获取日本国会新闻，后演变为“国会记者会”，是日本政治新闻最主要的发布渠道之一。

[8]小幡与陈?交涉的情况，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267～289页。

[9]1917年，为了换取日本对协约国的支持，英法两国均与日本有秘密约定，支持战后日本对于山东问题的主张。同时，日本还握有1917年11月签订的所谓“蓝辛—石井协定”，获得美国态度暧昧的支持。

[10]白井胜美：《日本和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第139页。

[11]藤本博生：《解题》，《日本报纸五四报道资料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第434页。

[12]莫里斯给美国代理国务卿的电报(1919年3月23日，东京)，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9》，第689页。

[13]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14]Re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den City, Doubleday, Page & Co., 1992, Chap XXXIII, p. 376.

[15]商金林：《一位日本学者眼中的五四运动》，《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第158～160页。

[16]吉野作造：《中国最近风潮观》，译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1919年7月15日)。

[17]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第204页。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编辑：邸皓)